

Best Hebrew Fiction Series

希伯来当代小说名著译丛

朦胧面纱

德高望重的作家托希贝晚年离开美国，迁居以色列，他决心为复兴希伯来民族的文化事业而奋斗。他在耶路撒冷寻访一位死者亲属，设法转交一笔遗产，从而引起了各种各样人的注意和一系列难以摆脱的矛盾……

约瑟尔·伯斯坦 著 廖慧祥 萧耀珍 译

A face
in the Clouds

主编 林骧华



安徽文艺出版社

希伯来当代小说名著译丛

林骧华 主编

朦胧面纱

约瑟尔·伯斯坦 著 廖慧祥 萧耀珍 译

责任编辑:吴 迅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8.125

插 页:2

字 数:185,000

印 数:5000

版 次: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761-6/I·1641

定 价:12.2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本译丛受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授权和委托,在中国翻译出版。所选四部 20 世纪希伯来小说名著,系该研究所主任尼莉·可茵(Nilli Cohen)女士推荐。历经数年终于成书,其间克服了不少困难。我作为译丛主编,除了组稿和审读、校订译文之外,当负向读者介绍的责任。

希伯来文学从古到今,经历了“繁荣—衰落—复兴”的过程,仿佛印证着犹太民族的历史命运。古代希伯来文学留下了一部传世经典《圣经》(主要是《旧约》),影响之大,无庸赘言。近代希伯来文学的复兴,与犹太民族特殊的生活历史与文化背景紧密相联,走过了一条艰难之路。(详情可参阅复旦大学顾晓鸣教授主编、上海三联书店“犹太文化丛书”中《近代希伯来文学简史》[1991]一书。)现当代希伯来文学的复兴,伴随着犹太民族的政治活动,也凝聚了众多犹太作家的心血,表明着一个民族在自己的文化之生存与发展中一种不懈的意志与努力。

本译丛所选作品,在现当代希伯来小说创作中代表了各个时期的思想与艺术(或“意识与话语”),尤其是以深沉忧郁的风格叙述灰暗的生存状况,集中地体现了文学对生命的理解。为方便读者理解作品,本文对它们的文学史背景作一些简要的介绍与评论。

一、以色列与希伯来文学

有人说,以色列是当今世界上最有趣的社会实验室。一方面,它对外陷于战争已经 50 多年,内部存在着宗教群体与世俗群体之间的冲突,东欧出生的与西欧出生的犹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政治上左翼与右翼之争,等等,使它“内外交困”。另一方面,它的文化发展却令人惊讶:东西方文化交融中的民间故事、舞蹈、各种无拘无束的艺术形式,各种社会实验,各种新的移民吸纳形式,音乐、戏剧、造型艺术领域前所未有的创新。但是最重要的是以色列文学时代的到来。

文学在以色列比其他任何艺术形式都更能把握住社会的活力,创造新的社会模式,揭示集体潜意识。以色列文学不仅使各种社会模式非神秘化,而且致力于摧毁陈规旧制,因而改变了公众对它的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的态度,使他们日益重视文学的意义。

现实与想象的联结是文学的任务,现当代希伯来文学出色地担负起了这一责任。作家们描述以色列人的普遍心态,尝试用人性的方式批评它,描述一个民族的情感和意识,关注国家的政治命运,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感。从总体上看,现当代希伯来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中通过各种艺术手段来触动读者心灵的地方,正是作家们所十分关注和深刻理解的“存在”,即人在现实中的地位和他们对自身地位的领悟,而他们在作品中对这种“存在”的洞察和表现可谓入木三分,即使在后现代主义的小说创作中,他们仍然坚持贴近现实,抛弃浅薄的唯美主义和对生活的冷漠态度,因而使文学具备了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在现当代希伯来文学创作中,作家们比较集中地表现一些

重大的主题：

(一)从不同的角度集中地反映犹太人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真正面对的问题——寻根意识，“回归家园”，对历史的记忆。当然，只有把握住构成以色列的新的民族同一性的两大要素——时间与空间——之间的关联，才能理解这种同一性意味着什么。

(二)现代犹太人面临的主要的两难问题：谁是犹太人？谁是以色列人？千百年来散居在世界各地，他们既保持了自己民族的一些固有传统，又在居住地（例如西欧或东欧各国）受到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社会意识等各方面的影响。“传统”与“反传统”之间的矛盾性和一致性之间如何才能达到平衡？

(三)新一代人的宗教背离倾向，以及各代人之间在世界观、价值观、民族认同等问题上的冲突。

(四)犹太人选择自己的民族国家及其正常化问题。撇开政治原因不论，他们的历史命运与现实生存状况使他们产生了什么样的认识。

(五)从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出发，也从自身的命运出发，厌弃和谴责暴力，主张人道主义和人对社会的责任，揭示真理，同时也揭穿谎言和伪善。

当我们透过这些主题来观察现当代以色列小说的叙事与话语时，既感到它们内中蕴含的一种相异于其他民族的历史经验和审美视角的张力，也能感受到在它的特殊性背后隐身的全人类各民族文学的共同性，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状况，在深层意义上其实都是整个人类命运的缩影。

关于现当代希伯来小说的总体发展概况，值得一提的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当代希伯来文学著名学者吉尔松·谢克特(1929～)所著的五卷本《希伯来小说史：1880～1980》(1977,1993)。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巨著。该书评述了起始于19

世纪 80 年代欧洲希伯来小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色列小说的发展史。重点介绍了从门德尔、艾格农、布伦纳等老一辈著名作家到伊扎尔、奥兹、夏勃塔依等当代重要作家。此书花费 20 多年的研究功夫,成绩斐然,包容面广,信息量极大,史料细节准确,涉及作家多,可读性也很强。其优点是“百科全书式的”,目前在以色列大中学校被普遍采用作教材。谢克特提出了许多饶有趣味的问题,来深入挖掘希伯来文学的价值根源。他探索了在以往百年文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现代犹太文化和文学的各种社会历史因素,包括无数次大事过程,例如东欧人的解放,犹太复国主义的诞生,贝尔福宣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屠杀,以色列建国。读者不仅可以从中了解现当代希伯来小说,而且可以全面地了解全世界的现代犹太文化,从而更进一步地对这百年来希伯来小说的时代、文化、民族背景有一种深刻的认识。

二、现当代希伯来小说家

在以色列立国(1948 年)后,生于以色列或者自幼移民并在以色列长大的作家,被称为“建国的一代”(State Generation)。其中最出色的代表是阿莫斯·奥兹和亚伯拉罕·B·约书亚,他们的作品中最吸引人的一种共同特征,是被称为“现代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表面结构,但在实际上,他们的作品始终围绕着个人与社会、民族与国家之间悬而未决的紧张关系与冲突这一中心主题。作品的主人公们竭力挣扎着,避免使个体的自我被犹太复国主义集体暴政的教条主义压力所摧毁。他们觉得“忠诚”威胁到他们自己的个性,这种冲突在小说创作的结构和风格方面有着重要的表现。各种形式的“现代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叙事以“代际对立”和“性别对立”为基础。作品一般表现这样的

主题：“彻底征服”是不可能的，犹太人面对的只有短暂的、暴力的、毁灭性的相互作用。

多年来，“现代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叙事方式统治着以色列的精神和文化氛围，尽管这不是唯一的表现方式。表现方式常常有一些重要的变化，但都被掩盖和边缘化了。这些变化包括：阿隆·艾帕尔费尔德的“部族—存在”叙事；叶扎克·奥尔帕兹的“存在主义历程”叙事；约书亚·克纳兹和大卫·舒兹的以基督教激情为基础的叙事；阿米丽亚·卡那-卡尔蒙、苏拉米斯·哈雷文、露丝·艾尔莫格、舒拉米特·拉皮德、耶胡迪特·亨达尔等人的女性主义叙事。

在此之后，“现代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叙事开始失去对文坛的控制。这个过程的最初迹象在70年代后期早已明显可见。今天，它显示为两种互补的倾向：耶和舒瓦和奥兹重新评价“建国的一代”的“现代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叙事中心的要旨；先前各种边缘化叙事的支配地位，有时以大胆的、咄咄逼人的新形式出现的旧叙事方式（即希伯来文学和世界文学中原有的方式）的重现。这些倾向既破坏了反映和形成“以色列同一性”的叙事方式，同时也标志着未来可能反映和形成“以色列同一性”叙事方式的某些特征。它们将对“文学—文化”正统体制及其力量基础形成挑战。

当代希伯来小说创作中有五种主要的叙事方式：

第一种是从传统中推陈出新的“（犹太）部族—存在”叙事，它重新获得了活力。近年来，有许多讲述犹太生活的作品显示出脱离、有时甚至剧烈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倾向。多数作品关注以色列和祖居地的东方犹太社团、部族的犹太人经历，还有些作家选择写现代犹太人的生活。

第二种是女性主义叙事方式。女性主义小说在许多方面打

破了男性化的“现代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叙事方式。好斗的女性主义叙事挑战正统体制的存在,在界定、形成和保持“文学—文化”记忆方面拒绝接受文学中的“男性霸权”。各种成熟的女性模式同标准的思维模式相矛盾,它们致力于系统地打破老一套传统的“女性形象”定制和仪式,尤其是使男性维持他们在以色列文化中统治地位的固定概念。

部族存在和女性主义叙事都是颠覆性的,代表着各种被忽略的小群体来攻讦“文学—文化”霸权。它们的最终目的无疑是要从根本上改革权力等级,但采用的方法不同。而女性主义叙事比其他各种叙事方式更激进一些。

第三种叙事方式是“儿童叙事”,以儿童和青少年的眼光来观察和描述世界,在失去天真的时代,指明成人对少年儿童的统治造成了破坏性的效果。“犹太复国主义—民族主义”所营造的“天真时代”生活幻景,在经历了大屠杀的悲惨历程之后就破灭了。而少年儿童眼中的成人世界也同样具有破坏性,小说表现的“拒绝成人世界”是一种精神的和文化的象征。

第四种叙事方式不仅反对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社会—文化”对立,而且提出了一种新的选择,呼吁承认一切人的雄性(包括女性主义叙事的“雄性”)。这种认识将会导致出现一种情感更丰富、更完整的人,在两性之间的冲突中不那么卑琐庸俗。“雄性叙事”无疑是当代最令人感兴趣的现象,开始真正代表晚近的以色列小说。有些作家仅将它作为母题,有些作家使它显现为更具结构意义和哲学意义的现象。

第五种是最极端、最具有颠覆性的、倾向于“混沌—神秘”的“反叙事”手法。这一派的杰出代表是约尔·霍夫曼。他首先在作品中表现对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的疑惑,他以避免或延迟构建一个“我”的方法,以掩盖实际世界的手法来提出问题。这种

“反叙事”的叙事破坏了一切原有的叙事方式,包括“现代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叙事。从这一观点出发,“世界”乃是由独特的、单一的现象组成,任何一种根据逻辑系统来分类和组织现象的文学创作和批评都遭到了否定。

以色列文化正在改变方向,作家和批评家们痛苦地目睹“建国的一代”文学和文化正统体制的倾圮,但这也是“一种辩证过程,很可能导致兴起一个能反映出新的、前途光明的“以色列同一性”的文学中心。

三、后现代主义希伯来小说

希伯来文学一向同世界文学在进行对话,尽管受外来影响的文学现象往往有些滞后。在其他方面,文学创新则几乎是同步的,例如乌利·尼桑·奈森的意识流小说风格与法国的普鲁斯特、英国的伍尔夫、爱尔兰的乔伊斯的风格几乎是平行发展的。同样的社会情势一般都导致相同的文学风格。

后现代主义方法并不寻求意义,而是让一切问题都开放着,提出每一种主张以及它们的对立面,视之为同等合法的真理。它迅速进入以色列文学界,或许是因为安息日战争的结果。战争粉碎了许多幻想与希望,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场战争构成的经验,对应于社会情势,创造出了复杂奇怪的文本,常常包含着各种矛盾的因素。

在以色列,就像在其他国家一样,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特定的类型。作家艾夫兰姆·海夫纳提出,后现代主义包含了“一切事物”。以色列后现代主义的奠基者们远远地超越了他们的时代,而不被同时代人所接受,例如小说家叶兹哈克·奥伦和诗人艾伏斯·耶舒伦。他们的特点是结构拼贴与文体风格拼贴的技

巧。80年代和90年代的年轻一代作家,包括约尔·霍夫曼、大卫·格罗斯曼、伊塔玛尔·莱维、艾夫兰姆·海夫纳、尤伐尔·希蒙尼、埃特伽·凯雷特、阿莱克斯·爱泼斯坦、艾夫纳·夏茨,尤其是奥莱·卡斯特尔-布鲁姆运用了各种拼贴手法来创作小说。他们作品的特点表现在令人感到新奇的混合形式,例如约尔·霍夫曼用日本俳句形式写中篇小说,叙述以色列的德国移民的生活故事(《伯恩哈德》和《费希的基督》);大卫·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用一种半现实主义的风格开始,接着运用“象征—神话”的风格,结尾用解构形式,整部作品就像后现代主义百科全书(见《在下面:爱》);奥莱·卡斯特尔-布鲁姆用歪曲变形手法描写自然风景和人类社会(《玩具娃娃城》),以及最近出现的埃特伽·凯雷特的哥特式短篇小说。

以色列有一批富于想象力的编辑们,例如伊拉娜·哈默曼、梅纳凯姆·佩利、切姆·佩沙和伊格尔·施瓦茨,他们鼓励这一类非大众趣味的小说,打开了一条新的小说艺术道路,通过后现代主义的创作,专门描写当代以色列社会的幻灭情绪和心理。自然,实践这一文学主张的作家都是年轻人。

“后现代主义状态”的明显特点是怀疑定制、艺术、理论,甚至认为“话语即表述方式的存在”也并不一定具有合法性。这种对经典的超叙事方式(例如:理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犹太复国主义,等等)尽管也提出了质疑,但是一般并不忽视理论。因此,任何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都必然不寻求意识形态,而寻求多向的活动,成为一种游戏,一种姿态,一个反讽其自身洞察的话语领域,以便汇合能指与所指,造成客观真实与多元声音聚会的狂欢真实。在这一点上,以色列文学有两个相互关联紧密的角度:

(一)应该将当代以色列文学放在文学理论和以色列文学史

的互文环境下来考察,揭示这两个层面之间的语义特征和文体风格特征。

(二)应该用一般理论术语来讨论以色列后现代主义文学。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当代以色列文学竭力想避免“地方色彩”,目的是要跨越以色列现代主义的边界。

以色列后现代主义的中心问题体现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青年作家的作品里,尤其是针对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而关注“异化”的普遍因素。当后现代主义试图界定“以色列同一性”的模糊界线时,理论焦点和思维焦点转向了越来越强烈的反讽——在以往的传统中,认为希伯来文学中的犹太复国主义起了一种“文化的解放者”的作用,但实际上试图成为“世界的拯救者”的以色列作家们的作用只是“以色列国会的守望者”。

怀疑主义的语言学也是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认为自身可以不受希伯来文学的主题传统以及现实主义语言学的束缚,所以刻意去创造一种“平易”的语言,不再追求语言的情感、智识、审美结构,视丢弃对语言的信念为一种解放和一种净化。然而作家们在新的美学追求中仍然必须探索关于艺术的基本问题的答案——艺术创造过程的奥秘何在?艺术作品的源泉是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后现代主义作家们对三种“解放”——人道主义的、本土的、犹太教的——持批评意见。他们从创作的主题角度力图根据以色列的新形象来作出精神上和美学术上的修正,于是也打破了旧的规范,开辟了走向新规范之路。

四、世纪之交的以色列文学

尽管今天是有线电视和电脑游戏受青睐的时代,以色列文学却以前所未有的活跃姿态出现在世界文坛上。新的作家不断

推出力作，吸引了更多的新读者。很明显，在过去的几年里，以色列文学有过一次小小的革命。新秀作家们并不追随前辈著名作家——阿莫斯·奥兹，亚伯拉罕·B·约书亚，阿哈隆·阿佩尔费尔德，约书亚·克奈兹——的脚步，他们的作品完全不同，因为他们的世界变了。大多数文坛新秀年龄都在20岁到30岁之间，还有一部分在40多岁到50多岁之间。他们的共同点和他们与前辈之间的不同都在于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后现代主义者”。这个术语一度很难被接受，但是它的存在不容被忽视。

最出色的文学新星之一埃特伽·凯雷特承认，他嫉妒老资格的作家阿莫斯·奥兹和亚伯拉罕·B·约书亚等人，但他认同那些“有点迷惘”的作家。以色列文学创作的最新潮流并不向读者提供任何解惑的方案——既不渴望拯救，也不寻求单一的真理。它空着手面对你，厌倦于概括真理和阐释伟大的思想。它不寻找意义，并且视世界与文明的一切都同等有效但是毫无意义。这种并不专心致志的好奇心通过丰富的想象，通过各种文学类型，通过积极玩弄文学陈规和文体风格来得到表现。

人们称这种写作像录像剪辑，反映出流行文化和文摘小报的影响。伴随着大众文化，在题材、技巧和语言等几个方面还间杂有精英文化——历史、神话、哲学和科学。然而文学类型之间的界限消失了，小说与诗歌的原理混合在一起，还有传记文学中的文献资料与伪研究混在一起。新锐作家们仿佛怀抱魔球——时而像游戏，时而像威胁，时而像梦魇；女性化妆成男性，男性戴上女性面具；阿拉伯人像犹太人，犹太人像阿拉伯人。这是一个奇谲的循环世界，内中闪耀着隐喻、引证、嘲讽，大多充满了幽默，但在玩笑背后隐藏着强烈的抗议，尽管有时目标不太明显，只表露出一种情绪。这群颠覆性的作家在动摇森严的等级时，产生了先前文坛上从未有过的新智慧。在新的小说中有一种很强

的女性主义成分,不仅是许多新进的女性作家,连男性作家中也有一种女性主义的倾向。另外,同性恋作家的创作也成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

这种边缘与中心的转换是世纪之交以色列文学的明显特征之一。大多数小说反映了一个移民的以色列社会的多重特点,它们的背景是移民们原居住的欧洲、南美、地中海各个国家。而传统与反传统的对立倾向,就像在其他各民族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一样,也是当今以色列文坛的一种重要现象。一部分作家忙于打破文学陈规,另一部分作家继承了这种陈规,曲折地遵循着希伯来文学的道路。前辈作家们(尤其是雅可夫·夏勃泰等人)的影响,仍然对文坛产生持续的冲击,但是在一些前程远大的新进作家身上,将会看见精彩纷呈的新局面。

五、布伦纳与《生死两茫茫》

谈论现当代以色列的希伯来文学,不能不说到约瑟夫·海姆·布伦纳(1881—1921)。

19世纪末,发轫于东欧的希伯来文化复兴运动中产生了众多杰出的作家,但是他们的作品并未被及时地翻译成其他文字。布伦纳是其中比较显著的一位代表性作家。他生于乌克兰,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在飘泊中度过,受过宗教教育,年轻时参加过犹太社会主义运动,但后来成了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者。从1901年起,他在俄国军队里服役3年,1904年去英国,在伦敦做一名排字工,并有两年时间担任希伯来文期刊《醒悟者》的主编。1909年移居以色列,先做农业工,接着先后在耶路撒冷和雅法定居,担任过教师。23岁时发表中篇小说《在冬日》(1904),奠定了他在希伯来文学界的名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致力于翻

译、文学批评和社会评论，作为一名杂文家、文艺理论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小说家和诗人，布伦纳在有生之年里成为以色列最著名的文学家之一。他和志同道合的作家们一起，推动了希伯来文学活动的中心从欧洲转到以色列。1921年，布伦纳不幸死于一次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的冲突。但在他去世之后，他的作品对希伯来文学创作的发展继续产生着有力的影响。

布伦纳的思想和生活充满了矛盾。作为一名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热忱地鼓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移居以色列，但同时他又激烈地批评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人。他天生是一个严厉但又真诚的人，一个悲观主义者，然而在他的其他一切信念都失败之后，他在自己的小说作品中表达了一种对艺术真理的信念。在他的文学创作想象中，生活只是一场在黑暗和幻觉的世界上为了生存的斗争，由永远的艰辛和灾难构成。他笔下人物的性格里都充满着犹豫和怀疑，他们想逃避，却只是奔向疯狂和死亡，而犹太教的文化也被看作是一种濒临死亡的文化。批评家艾伦·勒楚克说，布伦纳“笔下受伤的主人公们身上体现的那种无情地将一切都撕碎的想象，使小说充满力量，并赋予它一种准确而又有力的声音”。

布伦纳在小说创作中真实地反映出他对人类成员的个人境遇怀着一种深刻的悲剧意识，作品中人物性格复杂，但是其中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自我苦恼”。究其原因，这种苦恼的根源是怀疑和幻灭。

《生死两茫茫》(1920)的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巴勒斯坦的一个犹太人居住区。此时，未来的“阿拉伯—犹太”关系的悲剧格局已经成型。小说叙述的个人受难和孤独正是人类生存状况的写照。主人公赫菲兹是布伦纳小说人物中最典型的“孤独者”，他寻找精神上的家园。而他竭力尝试在巴勒斯坦建立一种新生

活，正象征着犹太复国主义的实验。

布伦纳以娴熟的文笔描写了耶路撒冷的日常生活。饥饿的犹太居民们为生存而挣扎，尽管主人公感受到生活的浮华和生命的空虚，情感受到折磨，但他还是认定：活着就是欢乐，行善使人愉快。

《生死两茫茫》是希伯来文学的“现代主义”代表作。小说不仅颇具意识流笔法的旨趣，而且也恰当地运用了当时欧洲文坛流行的弗洛伊德主义观念。在连篇的心理描述中，将从精神病院治疗半年后出院的主人公叶赫兹科·赫菲兹的病中潜意识、幻觉、妄想症、白日梦、对死的感受等等描写得十分精确。在叙事技巧方面，作者老练地运用散点透视、从叙述到反叙述等手法。在文化内涵方面，作者写到了来自东普鲁士的犹太人与来自俄国的犹太人之间的文化差异，也隐喻地表达了对近现代哲学和神学的讽刺。

小说中的一个主题是对宗教信仰的怀疑，由此从信仰与怀疑的冲突中产生了对传统的否定和背叛，尤其是产生了自我意识。主人公赫菲兹后来也不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而是“一个渴望阳光的人”，这不啻是一种超越的意识。这个主题的另一面是对现实世界的抗争，在赫菲兹和伊莎这两个人物身上，展现了移居以色列的一部分犹太人的真实生活情景，他们的性焦虑和神经官能症的幻觉，都是欲望得不到满足的表现。在上一个世纪的交替时期，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生活 在布伦纳的作品中像历史画卷一样，带着艺术价值有力地展现出来。他们原先那种通过移居以色列来开创新生活的希望破灭了，仿佛人总是逃脱不了命运。

布伦纳生前就被看作是希伯来现代文学的主要代表，近年来又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意，评论界和读者对他赞美有加。《生

死两茫茫》被认定为“对本世纪第二个10年里巴勒斯坦犹太人的生活作出了准确的描述，他的才华在这部小说里达到了顶峰，它是对人类生活的深刻观察和忠实记录”。

六、大卫·伏格尔与《婚姻生活》

大卫·伏格尔(1891—1944)生于沙皇俄国统治下波兰的波多利亚，青少年时代在加利西亚生活，后移居奥地利的维也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被奥地利人当作敌侨关进监狱。20年代，他开始发表至今在以色列仍备受推崇的希伯来诗歌。1929年，伏格尔移居以色列的埃瑞茨，并于同年出版了他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婚姻生活》。但是在两年以后，他离开以色列，先去了柏林，后定居巴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却又被法国人当作敌侨，一度投入监狱。1944年，他因为是犹太人而被纳粹占领军逮捕，关押在德郎西，后又被押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在那里遇害，死后踪迹全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伏格尔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之后在居住埃瑞茨期间创作了他的主要小说作品。在他去世多年之后，他的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和90年代上半期，被译成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荷兰语等多种文字出版，确定了他作为一名20世纪欧洲主要作家的地位。他的主要作品有《在黑暗的大门前》(1923)、《在疗养院》(1928)、《婚姻生活》(1929)、《面向大海》(1932)、《走向沉默》(1983)、《他们都去打仗了》(1990)。大卫·伏格尔的作品，一如他那颠沛流离的悲苦生涯，反映了20世纪上半期欧洲历史上令人恐怖的悲剧。

大卫·伏格尔的代表作之一、自传性日记体长篇小说《他们

都去打仗了》描写在1939年到1941年之间，主人公画家鲁道夫·威卡特和另外一些犹太人和侨民一起被关进法国的一个苦役集中营，他们被怀疑为德国派遣的“第三纵队”。威卡特和他的朋友们——泽利格森、安姆巴赫、塔克豪、罗森斯蒂尔、戴克曼——被从博尔格的第一个集中营转押到阿拉东，又被转押到劳利鲁伊。伏格尔不是喜剧作家，但他在这部作品中用黑色幽默的手法讲述了一个含义非常深刻的故事。在故事里，每一个集中营都会唤起囚犯们对上一个集中营的怀念，仿佛那里是失去的伊甸园，而可恨的法国集中营司令官勒鲁竟然被号称“零号小组”的威卡特和他的朋友们看作是可亲的家长。关押“第五纵队分子”的法国集中营在伏格尔的笔下成了“快乐的地狱”。集中营里不断地任意宣布新的规定，委员会长时间地开会但从不达成结论，毫无意义的审讯开始又结束，张贴公布的释放条件相互矛盾。有些囚犯获得了自由，例如罗萝夫人。威卡特却很消极，因为在他看来一切都毫无区别。威卡特的日记描绘出一个失去意义的时代，自我遭到抹煞，“这是一个公共坟墓，”留给每一个人的是一种溺水的感觉。他们被释放（囚犯们被装上封闭的运牛车厢，以为他们会被发送到非洲去）之后，产生一种梦幻：“我看到自己在一个大装配车间里，那里有无数的手提箱，草编货盘，钉子，木板，还下着倾盆大雨，我在一阵冷汗中醒来。”

这部重要作品不仅真实地描绘了历史，而且也证明了大卫·伏格尔在希伯来文学中的地位。“在迟到了六十年之后，他的地位毫无争议地确定了，他是希伯来文学的伟大创新者之一。”他的作品令人印象最深刻之处在于他对生活的深刻观察，他对人类各种情感的特殊感受，以及他那异乎寻常的原创性描述。在这部文字精确的日记体小说里，有一种雄浑的气息，无拘无束，而且充满着一种反讽意味。他用依地语写作，目的是利用依地语